**南 开 大 学**

本科生学年论文

中文题目： 丽末鲜初的儒教建国

外文题目： Founding a country with Confucianism from late Goryeo to early Joseon Dynasty

摘 要

丽末鲜初不仅是韩国高丽、朝鲜新旧两个王朝更替时期，还是韩国儒家性理学的初创时期。朱子学传入之初被先进士大夫们接受后作为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王朝开国后，性理学迅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逐渐代替佛教思想成为朝鲜王朝的官方哲学。韩国近代史上的朝鲜王朝是以儒家思想为建国和统治理念的“儒教国家”，其对现代韩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从儒教建国的视角出发，研究丽末鲜初的政治体系、教育机制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特点，且进一步深入探讨儒教对特定时期、特定王朝的更替和革新所起的指导性作用。

关键词：高丽末期；朝鲜初期；儒教思想；《经国大典》；科举制

**Abstract**

From late Goryeo to early Joseon Dynasty, is not only the replacement period of Goryeo and Joseon Dynasty, but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Korean Confucianism.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o-[Confucianism](javascript:endicAutoLink('confucianism');) was accepted by the advanced scholars as a theoretical weapon of social reform,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dynas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Joseon Dynasty, Neo-[Confucianism](javascript:endicAutoLink('confucianism');) quickly rose to the mainstream of the country's ideological field, gradually replacing Buddhism as the official philosophy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Korea is a Confucian country with Confucianism as the founding and ruling concept. It still has a wide social impact on the inheritance of modern Korean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unding of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educational mechanism and social customs from late Goryeo to early Joseon Dynasty,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guiding rol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replacement and innovation of specific periods and specific dynasties.

**Keywords:** late Goryeo Dynasty; early Joseon Dynasty; Confucianism; *Gyeongguk Daeje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目 录

[一、儒教理念下确立的新政治框架 6](#_Toc7098247)

[（一）高丽末期的政治状况 6](#_Toc7098248)

[（二）《经国大典》中确立的中央统治制度 8](#_Toc7098249)

[（三）两班体制的官僚政治——排除宗亲参与政治 9](#_Toc7098250)

[（四）民本主义政治——民意畅联制度的实施 10](#_Toc7098251)

[二、儒教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 12](#_Toc7098252)

[（一）朝鲜初期的教育改革 13](#_Toc7098253)

[1.郑道传的教育改革论 13](#_Toc7098254)

[2.乡校的扩建与运营 14](#_Toc7098255)

[（二）儒生与科举制度 16](#_Toc7098256)

[1.成均馆的扩大及其作用 16](#_Toc7098257)

[2.科举学制的变迁及考试科目的变化 18](#_Toc7098258)

[（三）特殊教育的发展——以盲人教育为例 19](#_Toc7098259)

[1.救济制度 19](#_Toc7098260)

[2.职业教育 20](#_Toc7098261)

[三、儒教理念下的社会风俗变化 20](#_Toc7098262)

[（一）祭典改编与禁止淫祀 21](#_Toc7098263)

[（二）儒教式祭祀的传承 21](#_Toc7098264)

[1.国家祭祀 21](#_Toc7098265)

[2.家庭祭祀 22](#_Toc7098266)

[四、总结 23](#_Toc7098267)

[参考文献 24](#_Toc7098268)

引言

1392年，高丽末期的将军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新生的封建王朝急需一种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郑道传作为朝鲜王朝的“总设计师”，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努力使儒学取代佛教成为朝鲜王朝的官学，以全新的建国理念取代高丽末期腐化的佛教。其革新思想主要集中于他的著作《经国大典》中，对朝鲜初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韩国政治思想史的总体观点看，朝鲜王朝的建立是佛教治国到儒教建国的一种文明转化。本文从儒教建国的视角出发，研究丽末鲜初的政治体系、教育机制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儒教对特定时期、特定王朝的更替和革新所起的指导性作用。

# 一、儒教理念下确立的新政治框架

高丽末期政治矛盾激化使社会极其不稳定，尤其是日益明显的佛教弊端刺激了朱子学派士大夫的现实改革之意。朱子学不仅对先进士大夫的认知程度和改革方案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对当时的政治矛盾提供现实对应策略，使新建的朝鲜王朝初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治框架体系。研究丽末鲜初这特定时期，不能不提起开国功臣郑道传和他编制的《经国大典》，在朝鲜王朝建立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下面主要对朝鲜初期政治制度的建立背景和几个主要特点进行详细叙述，深度研究儒教理念对政治引起的作用。

## （一）高丽末期的政治状况

10世纪中后期，光宗颁布的科举制（985年）和成宗所主张的儒教政治，使儒教势力不断扩大，并迅速发展。直到11-12世纪，他们垄断所有官职，确立了门阀统治。[[1]](#footnote-1)通过李资谦之乱（1126年）可以明确地看出，门阀贵族已经壮大为充分能够威胁王权的政治势力。肅宗统治时期被称为高丽门阀贵族政治的盛行期。此时已出现奢侈风潮，美風良俗的泛滥，乱收税款和赋役金，天灾地变等多方面的混乱。虽然包括国王在内的朝廷官员们试图提出许多积极的方案去解决问题，但没有彻底根除其问题的本质原因。大多数官员们的腐败行为越来越严重，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门阀贵族政治的矛盾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使之加速各种秩序的混乱和倒塌。由于长期实行崇文抑武政策、官僚们的腐败行为盛行、王的奢侈生活等等原因，1170年武臣们发动了政变。[[2]](#footnote-2)武臣政变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下层阶级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可知武臣政变是政治社会潜在的身份等级矛盾爆发的产物。[[3]](#footnote-3)但武臣政变后，政治秩序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百姓生活条件更加恶化，腐败力度日益加重。走投无路的百姓们只能联合发动叛乱，赵位寵之乱（1174年）后逐渐扩大为全国大规模的起义。进入13世纪后，雪上加霜的是，如此混乱的高丽还与当时最强的蒙古国进行了长达40年（1231年-1270年）的战争。战争结束不久，元朝开始干涉高丽的内政，并且要求提供大量的贡物。元朝的强度干涉使高丽政府不断压迫百姓、激化矛盾、导致政治混乱，[[4]](#footnote-4)不能实施强有力的改革来改善局面，随之国家制度及其政治体系逐渐崩塌瓦解。恭愍王登基（1351年）后面临“元明交替”的国际政事变化和倭寇的侵略等外患，直到朝鲜王朝建国之前一直持续着其混乱状态。[[5]](#footnote-5)

可以通过下面的折线图清晰地看出，高丽王朝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秩序，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变化的趋势。武臣政变、对蒙抗争、元朝的干涉、恭愍王的上位，这四大典型事件加速了高丽王朝的矛盾激化和秩序的崩塌，不得不使先进士大夫们认清高丽后期的政治情况，为建立朝鲜王朝而做思想准备。朝鲜建国初期郑道传等先进士大夫们主张的政治思想，与高丽后期的政治社会矛盾，排佛论和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最终创新性地把这些都归结为朱子的儒教道统之说里，使儒教逐渐代替佛教的主导地位，成为朝鲜王朝的正统思想。

## （二）《经国大典》中确立的中央统治制度

性理学的儒教理念为朝鲜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让人们认为通过易姓革命建立的这个王朝是神意，并正当化其革命的暴力性和灾难性。从而儒家理念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对国家政治和行政的整体结构构成和运行起了重要的影响。先进士大夫的代表—郑道传的改革维新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著作《经国大典》中，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了朝鲜王朝的正常发展，是朝鲜王朝治国的基石。尤其是在政治方面上确立集权的中央统治制度，建立比较严密的政治体系，初步解决政治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专制统治。虽然官职的名称存废有一定的变动,但是整个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总体上都遵循了《经国大典》的规定。

《经国大典》中规定的中央统治制度为强化王权，对议政府署事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以六曹直启制为基本结构的政治体系。[[6]](#footnote-6)朝鲜王朝的官职仿照中国，分为正从九品，由正一品到从九品，共计十八品。正三品以下的大部分官府作为属衙门归于正二品衙门的六曹，六曹的堂上官以代表身份参与朝仪讨论国事，从此六曹实质上成为国家政治体系运营的中心机关。[[7]](#footnote-7)六曹为了使各曹高效率地完成所分配的职务，设立3-4个属司并任命堂上官进行管理。虽然议政府是正一品衙门，但它的职责明显缩小，权力不断弱化，在《经国大典》中已用法定化方式确立了其名存实亡性。直属于国王的官府有宗亲府、忠勤府、仪宾府、敦宁府、承政院、司宪府、司谏府等等。除了这些直属机构以外，其他官府都是六曹的属衙门。实际上，六曹直启制得以运行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种。第一，六曹的堂上官可以对属衙门官员行使人事权，决定他们的登用和罢免，因此属衙门的官员们必须服从于六曹官员们。第二，属衙门只能通过六曹向国王启文，没有其独立发言权。属衙门包括堂上衙门和堂下衙门，衙门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负责的详细职务不同。

## （三）两班体制的官僚政治——排除宗亲参与政治

高丽末期，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士大夫们为建立排除私权和支配关系的国家运营机制而竭尽全力。他们提倡排除私欲和追求公理的性理学政治思想[[8]](#footnote-8)，因此朝鲜王朝建国以来，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一直是通过国王与官僚、官僚与官僚间的相互沟通和牵制来提高政治的公共性。朝鲜王朝的统治体制是批判继承高丽时代两班制度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改编而形成的。统治体制的构造和机能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绝对王权与两班官僚之间，官僚与官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调和机制。但这种政治运营理论体系，并没能完全贯彻到真正实施的统治制度中。导致理论与实际发生严重偏离的是国王的同性亲族，即宗亲的存在。 朝鲜建国不久就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提出了排除宗亲参与政治的原则，但这原则的实际适用与法制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宗亲是君主专制的产物，研究宗亲的构造特征对于研究东方封建主义和朝鲜王朝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宗亲作为奉承天意的王家一员，其身份和地位非常高贵，根据此特殊的性质无法完全从属于国家政治的官僚支配体系。王族概念层面的宗亲独享天潢贵胄的声威，既是头等高门，又是特权阶级。[[9]](#footnote-9)其家国关系至为紧密，因此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朝鲜建国初期对许多宗亲们授予了军官一职，大部分是从高丽末开始在战场上奋斗的武将们，都拥有着强大的自家私兵。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因宗亲是王室的一员，而是因为对他们的支配被认为是王的私权领域，无法进行干涉。实际上这时期的宗亲登用，待遇和惩罚等等都是根据太祖个人的判断来决定，并不是在朝廷上通过官僚们的讨论。随着两班体制改革的深入，尝试着通过军事一体化来剥夺宗亲权力，维护官僚政治制度的秩序。但宗亲们对此不满，引起了第一次王子之乱，排除宗亲参与政治的活动的想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宗亲的政治排除原则第一次确定是在定宗继位第2年(1400年),解决好第二次王子之乱之后。太祖时期所取的措施被认为是临时方案而被否定，与之相反，定宗时期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讨论而决定的指令载入法典里[[10]](#footnote-10)，确定了排除宗亲政治的法定原则，将律文定为“祖宗成宪”，不可变动。

太宗登基后赵思义之乱发生，继续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宗亲们就重新负责军官一职。比起理论上的法制和名分，还是要优先考虑急切的现实需要。但在太宗继位的第11年末，对宗亲进行了大规模地整顿工作，排除宗亲政治的原则重新在现实上运用。不是太祖直系的亲族们在放弃宗亲身份的前提下可以继续维持已有的官职，除此以外，其他宗亲们一律没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朝鲜建国以来经历许多政变和制度改革之后，宗亲们不能再作为国王的政治同伴共议国事[[11]](#footnote-11)。因此，跟国王一起统治国家的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宗亲们，而是通过科举制选拔的士大夫官僚们。

## （四）民本主义政治——民意畅联制度的实施

西方从中世纪开始就有“民声是神之声”的说法,东方也从很久之前开始传来“天听自我民听”之说。实际上可以把政治概括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形成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既要有统治者的强烈意志，也要满足被统治者的需求，使他们服从于统治制度。统治者为了提高执政效率，必须要提前感知被统治者的意思。提前感知人民的意思，并把它作为参考指标的反而是绝对主权时代的理论家们，其代表人物为马基亚维利、霍布斯等等。但他们感知民意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提倡，只是服务于统治者使其统治更加有效的伪装术罢了，并没有真正关心民生及采取现实性的措施。[[12]](#footnote-12)开始把民意当作政治的主体，或者如帕斯卡尔所说的一样作为“世界的女王”（Queen of the world）来议论，是很久之后的民主主义者们所提及的。孟子主张得天意的方法是得民心，得民心的方法是根据民意进行统治，充分体现出他的政治思想是以民意为基础的民本思想。国家政治决策必须要依据民意做决定，民意成为国家统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才能防止种种弊端的出现，促进统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

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相比起庞大的社会规模，内部的沟通与交流较少，导致了整体与内部的隔断现象。政府向国民传达决策的上意下联过程虽很重要，但国民向政府表达心愿的下意上联程序才是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朝鲜王朝在立国之初比较尊重国民的发言权，一定程度上通过独特的方式开放了言路。民意上联的通路与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等的变数有着函数关系，所以在研究民意上联的通路之前，要先对朝鲜王朝的政策决定过程进行初步了解。朝鲜王朝的政治体制总体上讲是依据专制原则而形成，但由权力构造方面看其性质并不是绝对主权体制而是官人支配体制。当时官人间的会议制和监督机构极其发达和完善，各权力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化相当明显，自律性也较高，通过相互配和牵制来防止出现权力的集中现象。国王的地位受到国内政治文化方面和国际政事的双重限制，不能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独断地进行决定。朝鲜王朝的政策决定过程反映了儒教统治原理，保障统治者的贤明和被统治者的善，使官人们的意思和民意投入到决策中。[[13]](#footnote-13)

在此政治状况中，朝鲜王朝的民意畅联制度有以下几种。第一，作为仪礼的途径向最高决定者——国王所提出的要求和意思表示间接地投入到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即作为国王定期与宰臣和诸卿决定政策的一般化及定式化的制度，使间接地实现民意上联的手段。第二，文书或口头传述的途径。文书的方法主要有上疏、封事、状启、书启、奏本等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通过上疏的下意上联形式。第三，直接行动的途径。上疏等文书方式和口头传述方式都行不通时就采取直接的行动，使需要上联的意思表示贯彻到决策过程中。即主要包括堂上官在阁门外进行伏阁、参上官和参下官主要在宫廷大门外进行伏阙、士林和成均馆儒生们通过“捲堂”（罢课），一般民众们通过“叫阍”（鸣冤）进行呼吁的方法。[[14]](#footnote-14)除此之外也有直接上达给国王的请愿上诉书，作为告发制度的申闻鼓制度和反映民意的最后革命手段——民乱等等。第四，潜在途径。主要是指依据国王的私密命令，派遣于全国的暗行御史制度与为倾听民声国王亲自出行视察民情的活动。总体上这些装置体现出朝鲜王朝在政策决定过程中采取了博询采纳的方式[[15]](#footnote-15)，下意上联的言路比较开放，民主反馈机制有许多合理的侧面和民主的因素。但这些并不源自民主思想，而出于保障统治者的善与贤明、确保被统治者的幸福的儒教政治原理中。民意畅联机制的合理方面，随着社会阶级制度的硬化和儒教教理的变质而受到了限制，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

# 二、儒教理念指导下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

朝鲜王朝以儒教为统治理念，主张儒教理念的民本主义政治，使百姓们自觉服从于统治制度，很少用武装统治压迫人民。朝鲜建国初开始为了广泛普及儒教理念和培养儒生，在中央设立成均馆，在地方各地建立起了乡校。为了在官僚选拔制度中充分体现儒教理念，全国大规模地进行了科举制度。虽然从高丽时期开始就实行了科举制，但大部分官职都被门阀阶级垄断着，它实际上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只是形式上的幌子。与此相反，朝鲜建国以来实行的科举制，使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得到官职，而不是依据身份的尊卑从一出生就决定，因而提高了考试的公正性和官僚选拔的公平性。除了儒教理念的普及外，还非常注重实用文学的教育，实行生徒制度和杂科制度来选拔官僚。[[16]](#footnote-16)在这种儒教理念的大原则中残疾人也不是例外，同样能接受教育，有才智就可以得到重任。盲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且能够得到适当官职的国家就是朝鲜。下面通过深入研究朝鲜初期的教育制度，思考儒教如何代替佛教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理念。

## （一）朝鲜初期的教育改革

朝鲜初期是新王朝确立各方面体制制度，国家整体机制步入正规的重要时期。先进士大夫们在各方面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方案，深化教育改革是中心任务之一。朝鲜初期比较典型的教育改革方案大概为以下几种：太祖登基第三年（1394年），为教育地方政府的土官子弟们专门设立学校[[17]](#footnote-17)，司谏院还提出了关于学问振兴的建议；太祖登基第七年（1398年），封权近和郑道传为成均馆祭酒，高度重视儒生的教育水准；太宗登基第七年（1407年），司谏院上疏了关于登用人才的计划；太宗登基第13年（1412年），权近起草了关于权学教育的提议。除此之外，太宗和世宗时期还有其他许多关于教育改革的议论。在如此多的改革方案中，我试着通过研究最具影响力的郑道传教育改革论，初步研究朝鲜初期的教育方针及其具体措施。郑道传作为开国功臣，不仅对政治制度的整顿起重要作用，也对教育制度的确立做出了非凡的贡献。郑道传主张继承周代教育制度和入官制度的基本精神[[18]](#footnote-18)，因为其最大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官学积极培养人才，提供均等的机会，完全根据能力选拔官僚。

### 1.郑道传的教育改革论

郑道传作为大儒李穑的弟子，与郑梦周和李存吾等人士交游中讲论经史，特别擅长于文章和性理学。郑道传的思想倾向大致可以概括为经学主义和性理学两种。在恭愍王登基第十九年（1369年），成均馆重营后李穑成为成均馆大司成，郑道传被举荐为成均博士。兼任学官时期，他每天都讨论性理学，大约持续了5年左右，是性理学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郑道传是丽末鲜初排佛论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通过他对佛教教义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朱子学才获得官学的地位，成为朝鲜朝的官方哲学[[19]](#footnote-19)。而且，经他的积极阐发和努力，朱子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等领域的诸多观念和思想在此后韩国性理学发展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阐发。但禑王继位（1374-1388）后，郑道传强烈地反对李仁任等人士所主张的亲元政策，被判为五刑之一的流配罪。之后他在流配地看清高丽末期的政治社会矛盾，开始构建起新社会制度的蓝图，帮助李成桂主导易姓革命和社会制度改革。朝鲜王朝初期提出了17条改革修正案，除了田制、中央集权制等经济、政治方面以外，很多部分是关于整顿学校及科举制度，振兴儒学的教育改革方案。

郑道传关于教育和科举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书《经国大典》中，是实现儒学立国政治理念的通道。郑道传主张设立成均馆，乡校等国立学校，入学的人以士的身份开始学习，国家要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当作下一代官僚人才来进行教育和培养。郑道传认为人不是一出生就拥有士的资格，而通过后天培养才能形成真儒的人格，强调了儒学教育和入官制度的重要性和公正性。每隔三年一次，都要根据士的才能和考试成绩选拔官僚，这就是所谓的科举。明显可以看出郑道传重视教育和官僚选拔的连贯性，即他的人才培养和登用人才政策紧密相连。科举就以在学校学习的士为对象，考试科目主要是四书五经与赋论，能够充分体现真儒教养的形式。郑道传认为选拔人才的重点应该放在与人格教养密切联系的经学上，而不应全靠轻薄的词章，因此他主张登用精通经书又善于词章的人才。他还立足于以仁为主体的儒教哲学，提倡建设起真正实践三纲五伦的道主社会。

### 2.乡校的扩建与运营

乡校作为地方官学，可以看作是成均馆的缩小版。根据《世宗实录·地理志》和《经国大典》记载，在州、部、郡、县各设立一个乡校为基本原则。随着高丽后期性理学思想的深入，道德守信与社会教化逐渐成为官学的主要目的。乡校从高丽时期开始到庚戌国耻（1910年）之前，长达500年时间引领了地方教育，对地方人民的风俗文化发展和人才登用起了主导作用。高丽时期儒学思想只限于政治领域，朝鲜时期开始扩大为社会各领域。朝鲜开国时先进士大夫们主张儒教建国，普及儒学思想及扩大教育机关成为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太祖（1392-1398）继承高丽的教育制度，试图通过运营成均馆和乡校来完成性理学教育秩序的改编。迎合时代环境需要，实行官学教育活跃化政策，推进儒学思想的传播与统治地位的确立。乡校教育贯穿着整个朝鲜时期，是朝鲜教育方针的关键部分。

|  |  |  |  |
| --- | --- | --- | --- |
| 行政单位/道 | 大都護府 | 郡，县 | 合计 |
| 京畿 | 10 | 32 | 42 |
| 忠清 | 4 | 51 | 55 |
| 庆尚 | 11 | 55 | 66 |
| 全罗 | 7 | 51 | 58 |
| 黃海 | 5 | 19 | 24 |
| 江原 | 6 | 18 | 24 |
| 平安 | 10 | 35 | 45 |
| 咸吉 | 7 | 8 | 15 |
| 合计 | 60 | 269 | 329 |

表1《世宗实录·地理志》中记载的全国乡校状况[[20]](#footnote-20)

研究朝鲜时期乡校的运营离不开四个部分，即校生，教材，教育过程和教官政策。校生就是指在乡校学习的学生，《增补文献备考》中明确规定乡校入学资格：“无论是贵族还是出身于贫困家庭，只要作为儒生对学问有所追求就可以入学，没有身份上的差别对待。……另外还附加一条条例：入学考试成绩必须达到一定要求，有10名以上的校生推荐才可以入学。” [[21]](#footnote-21)充分表现出乡校入学资格并不是取决于身份的尊卑，而是通过个人对学问的热情与才智。校生的最大特权是具有参加科举制的资格，甚至成绩足够优秀就可直接选拔为教官或进入覆试。乡校的整体教育过程中最重视的教材是朱子所著《小学》，作为编制儒教社会道德规范的入门书籍，对校生的道意识与伦理意识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在教育过程中教官严格遵守读书顺序，先读《小学》培养校生的根本人格，之后读《大学》及《近思录》决定其知识规模。

朝鲜王朝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国家统治理念的儒教思想，依据“一邑一校”的基本原则设立乡校，达成培养地方官僚人才与教化地方社会的目的。朝鲜初期，中央接收地方官员的提议，投入大量资金新建乡校，在地方扩大其规模和作用。根据史料可知，位于边境的军事警惕区域也设立学士，聘请教官实行教育。[[22]](#footnote-22)国家主导大规模乡校建设主要针对的是分散于地方各地的高丽末贵族势力，他们反对新王朝的建立并在地方行使其影响力。先进士大夫们想通过强化地方教育实现新政治理念的普及与散播，进一步改善这种局面及维护新社会制度。

## （二）儒生与科举制度

在《经国大典》第三卷《礼典》中的“奖劝”一条明确区分儒生与校生：儒生是成均馆和四学的生徒；校生是乡校的生徒。朝鲜时期科举制是通过考试选拔国家官僚的制度，考试形式包括文科、武科、杂科、生员、进士等等，要注意的是拥有学籍的人才具有考试资格。议政府，六曹或官厅的堂上官在每年春天（三月初三）和秋天（九月初九），通过制述选拔3名成均馆儒生，赋予直赴文科覆试的应试资格[[23]](#footnote-23)。每年6月在四学中各抽选20名儒生，由正三品以下的三名文官在南学通过讲论和制述选取10名优秀人士，赋予应试生员或进士的覆试资格。成均馆儒生所用的教材涉及经典类、子集类、史记类、古文类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书五经。它既是成均馆教官在教育儒生时使用的基本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之一。成均馆的儒学教育与科举制有密切的关系并随之变化，以成均馆儒生为对象的文科考试内容变化决定着成均馆的教书内容。

### 1.成均馆的扩大及其作用

朝鲜初期提出大量的教育改革方案，成均馆开始从数量和质量上逐渐扩大与提高。成均馆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人事方面，具体可以研究成均馆的教官和儒生。随着改革的推进，成均馆教官机制的整顿经历了几次变化和发展，大体分为三阶段。第一，太祖元年（1392年）7月对成均馆教官机制的整顿及之后的修改案；第二，《经国大典》中确定的教官机制；第三，《大典通编》、《大典会通》中规定的成均馆教官机制。朝鲜初期成均馆教官机制的制定是从太祖元年7月改编新王朝的官职开始，除了修改一些教官职称或品阶以外，大部分继承了高丽末期的成均馆教官机制。朝鲜建国是由李成桂等武装派和高丽末期信奉朱子学的先进士大夫们共同协作的结果，丽末士大夫们在政治界和教育界起重要作用，特别是主导成均馆的中心力量。他们大部分担任成均馆教官一职，所以不需要进行大幅度地改革。

太宗元年（1400年）变更成均馆教官名称与品阶，这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名称变化，本质上意味着复原高丽末期以经学为主的教学体系。成均馆实现教育活跃化是在世宗时期，世宗颁布成均馆振兴政策：儒生的正员从100名扩张到200名，用成均馆的财政收入支付奴隶和土地1000结的费用，制定儒生们在学习中需要的学龄等等充实了成均馆教育内容。[[24]](#footnote-24)《经国大典》规定了朝鲜王朝的各方面体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根本所在。《经国大典》中确立的成均馆教官机制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成均馆教官机制与世祖12年正月相比，正员从23名扩到38名。第二，直讲的久任。成均馆教官机制中直讲的正员是4名，官品是正五品，法定化其中一名的久任。第三，博士以下的职位由议政府的司禄1名与直讲以下的2名兼任。1785年颁布的《大典通编》综合整理了《经国大典》中确立的成均馆教官机制及之后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为成均馆振兴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

朝鲜初期成均馆的改编与扩大，主要对朝鲜社会的两个方面起主导作用：分别为振兴儒学与人才培养。儒教理念作为朝鲜王朝的统治理念，需要向百姓和儒生传播高丽末开始流传的性理学思想，成均馆作为中央最高教育机关负责研究性理学理念及普及儒教思想，担任教育改革的中心体作用。成均馆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教育过程，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的科目制定方面。先进士大夫为了巩固丽末鲜初的政治地位，以科举制的复兴取代世俗的座主门生制。成均馆以官僚人才培养的教育目的进行整顿是由高丽末朝鲜初的政治情况决定的，急需普及儒教理念巩固新建的社会制度。根据朝鲜初期教育改革方案，整顿成均馆教官机制与教学内容后，以此为中心培养符合新社会的儒教人才并登用。为了鼓励成均馆教育，采取教学振兴政策给予了经济、政治方面的特权。其内容包括提高教官品阶，优秀儒生可直接进入文科覆试，提供奴隶与地亩等等。科举考试内容与成均馆的教学过程密切相关，直接影响教学内容及官僚人才登用。

### 2.科举学制的变迁及考试科目的变化

朝鲜初期的科举制是在儒教建国的总体方针下，为确立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而实行的，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不断地变化发展。太祖（1335-1408）时期指明了科举制的基本方向，直到世宗（1397-1450）时期才完全确立。科举制根据考试类型和应试者分为文科、武科、杂科、生员、进士等等。成宗（1457-1494）时期颁布的《经国大典》以法定化的方式，明确地规定考试时间，考试科目，合格人数等等的具体细节[[25]](#footnote-25)。英祖（1694-1776）时期，补充和修订《经国大典》中提及的内容并写进《续大典》中，推动科举制的完善与法制化进程。但是在高宗登基第31年（1894年），军国机务处认为通过形式上的科文难以选拔通识国情的人才，从而废除了科举制，致使它在朝鲜历史的舞台中完全退出。

科举制以考试的形式选拔国家统治与国家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官僚人员，直到1894年新的官僚任命制度出台之前，一直是朝鲜历史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考试科目大体分为文科、武科、杂科，依据儒教理念统治国家的文治主义朝鲜王朝中最受重视的一科是文科。[[26]](#footnote-26)文科的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由国家指导阶层决定，深度思考参与国家机构运营的官僚们所必备的素养应是什么，即取决于符不符合统治阶级所规定的人才标准。朝鲜初期关于人才规定的上疏中可以看出，通过文科选拔的官员必须满足三项要求：第一，精通经学；第二，善于处理事务；第三，精于文章书写。参与朝鲜建国的士大夫们普遍赞同上疏的内容，文科的三场考核方式如实地反映了人才选拔原则。文科考试初场考察对经学的掌握程度，中场以赋、额、铭、记、表等方式测试文学素养，终场通过策综合评价个人对时政的了解程度与独特的政治见解。其中朝鲜初期争议不断的是初场的考试形式，究竟用口述还是用制述来考核经学成为长期困扰官僚们的疑难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讲制是非，初场考试有时用讲经，有时用疑、义等方式，不断地进行变动，没有得到统一的共识。最终《经国大典》以法定化的方式明确规定文科初试初场是制述，覆试初场是口述，且新设明经科。[[27]](#footnote-27)

|  |  |  |  |
| --- | --- | --- | --- |
| 考试阶段 | 二 分 科 目 | 试场 | 考 试 科 目 |
| 初试 | 制述 | 初场 | 五经四书的疑、义、论中选两篇 |
| 中场  终场 | 赋、额、铭、记中选一篇  表、笺中选一篇  对策一篇 |
| 讲经 |  | 四书五经 |
| 覆试 | 讲经 | 初场 | 四书三经 背讲 |
| 制述 | 中场 | 赋、额、铭、记中选一篇  表、笺中选一篇 |
| 终场 | 对策一篇 |
| 殿试 | 制述 |  | 对策表笺颂箴制诏中选一篇 |

表2 成宗元年（1469年）文科考试科目

《经国大典》中记载

## （三）特殊教育的发展——以盲人教育为例

### 1.救济制度

通过史料可知朝鲜王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在儒教理念指导下自然而然地蔑视或无视残疾人，剥夺他们作为一个生命体值得拥有的正常生活。恰好与之相反，比普通人更加重视残疾人，提供各种救济方案实现他们在经济和生活上的独立，其中还包括对赋役的减免。王族和士大夫们也不像以前一样隐瞒自身的残疾，反而正正当当地表现出来得到相应的优待。比如在出役时可以排除在外，国家面临饥荒时优先给予救济品等等。朝鲜盲人教育的起初目的就在于救济，因为盲人虽然看不见，但其他感官器官比一般人灵敏很多，通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充分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谋生。朝鲜王朝的治者们尤其是儒者们已有关于人权的成熟认识[[28]](#footnote-28)，认为世上没有一出生就因先天的缺陷而被抛弃的人，都可由后天的教育来挖掘潜力及充分发挥其优势。

### 2.职业教育

朝鲜时期盲人教育的目的与现时代的特殊教育差不多，都在于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实用性能力，使他们能够担当适当的职务来追求生活上的独立。因为仅仅通过现有的救济制度提供救济金和救济品是有限的，且这繁杂的过程要通过几个阶段才能真正实行。反而，在盲人找到工作之后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自立，在国家角度上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救济程度。因此接受一定的培训之后，对一些盲人们进行了命相学，管弦合奏等等的职业教育，充分表现出朝鲜时期特殊教育的发达程度。

朝鲜王朝不允许男人随便进入女人们独存的空间，无论是王室还是士大夫等民事的正房均被禁止。但因盲人看不见，所以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进出出。他们虽然看不见，但通过职业教育的培训，可以成为命相盲人进入正房在女人的正对面算命，也可成为管弦盲人在太后、皇后、王世子妃等参加的重要宴席上演奏管弦乐器。表面上看盲人确实有着视觉上的障碍是先天性的缺陷，但实质上他们却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盲人失去视觉之后其他感官器官的机能极度发达，有的拥有超人的记忆力从事于占卜业和读经业，有的依据出众的听力成为管弦盲人等等。并不是因为盲人的身份而在寻职和种种机会面前受到限制，而是通过职业教育的培养与自身努力的结合充分能够入职为官员且得到重用。这种实例告诉我们朝鲜时代关于残疾人的认知程度比较高，残疾人人权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

# 三、儒教理念下的社会风俗变化

儒教对韩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排位祭祀方面，表明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高度重视孝、忠、信等思想的传承。高丽末朱子性理学传入后被先进士大夫们所接受，是支撑朝鲜王朝建立的理论基础。朝鲜建国之初开始儒教理念逐渐代替佛教思想成为统治理念，学者们崇儒排佛的趋势也日渐明显。治者们通过儒教礼仪的各种象征性活动，更加有效地保障其至高无上的权威。“礼典”中提及的祖上崇拜是最突出地显示儒教精神的仪式，因此孔子一直强调祭礼的重要性。祭礼使亲族们聚集在一起强化了血缘共同体的纽带关系，给予家族成员们相扶相助的机会，担当着推动血缘共同体之间互相协助的社会文化机能。儒教比较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为了长久维持好这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一方面父母必须爱惜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实践“孝”精神。“孝”精神的传承不仅停留在先祖活在世上时，在死亡之后也需通过祭祀等方式来维持。

## （一）祭典改编与禁止淫祀

高丽时代从王室到一般百姓们都信奉巫俗，高丽末这种现象更加盛行。接受性理学的先进士大夫们强烈批判巫风的盛行，认为它是淫祀，其中主要反对的是巫堂。12世纪儒者们主张将巫现逐出到城外，14世纪规定除了《礼典》内容之外的所有祭祀都视为淫祀，并对此进行理论性地批驳。随着性理学逐渐成为朝鲜王朝的统治思想，批判淫祀的理论更加有序，儒教文物也不断完备。儒者们不仅批判淫祀，还提出了关于禁止淫祀的各种方案。方案的施行大多取决于朝廷中掌握实权的集体或国王和王室成员的宗教倾向。朝鲜初太宗时期实行了大规模地祭典改编，使百姓们普遍接受对山川祭的批判。成宗时期大大支持儒臣们的主张，根据他们提出的方案司宪部制定了“禁淫祀节目”。[[29]](#footnote-29)成宗登基第九年(1478年)下令严禁淫祀，并且完善《经国大典》中《礼典》的内容。高丽末朝鲜初的淫祀论受到儒教思想的批判和冲击，其作用逐渐开始弱化。这意味着儒教礼仪广泛传播并牢固在人心的同时淫祀不断被缩小直到禁止。

## （二）儒教式祭祀的传承

每个时期因受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宗教倾向的影响，祭祀方式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可以通过其差异可以初步推断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等因素。下面主要分为国家祭祀和家庭祭祀两个部分，研究儒教思想对丽末鲜初祭祀方式进行的调整，并进一步观察哪些方式传承到至今。

### 1.国家祭祀

高丽时期也接受部分的儒教理念，并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手段。高丽太祖（877年-943年）在儒教所主张的“天”思想的基础上，阐明了高丽王朝的建立与统一后三国的必要性。他以儒教的方式实行祭天仪礼，试图根据天人合一说和天人相关说实现儒教的政治理念。成宗继位（981年）之前五庙制已形成且有建成的太庙，但此仪式却在佛教、道教和土俗信仰结合的状态下执行。朝鲜太宗登基（1400年）中后半期，对以前的国家祭祀活动进行了整顿，其次数和对象大幅度地扩大，展现出与高丽时期不同的现象。朝鲜时期国家祭祀是在整顿中央祭礼的同时摸索向地方扩散儒教思想之路，但实际上中央和地方推进事务进展的方向具有明显的差异。后者是在考虑如何将模仿天子的高丽时期仪式，合理地改变为诸侯国的体制下进行了对中央祭祀的整顿。国家祭祀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区别，但宗庙制，社稷大祭,释奠祭到至今为止还传承下来。

### 2.家庭祭祀

家庭祭祀的种类和方式受到地方和身份的影响会有一些差异，下面主要介绍最常见的几种。第一，忌祭祀。忌祭是指一年一次在故人去世的日子进行祭祀的家族活动，对韩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忌祭的对象原是到祖宗上辈四代，但根据《经国大典》和“国朝五礼仪”的规定，不同的身份等级可以祭拜的祖宗代数不同。但到朝鲜中期祭拜祖宗四代的方式比较普遍化，不受身份的限制继续维持下来。第二，不迁位祭祀。原先的祭祀只是祭拜到高祖父，即四代祭祀，过了第四代的长辈就不再拜祭。但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或者声望很高的人们，国家会允许其牌位永远不被挪移。不迁位祭祀的对象包括开国功臣，王子，还有王妃的父母等等。供奉不迁位祭祀是家族的光荣，也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朝鲜初期根据官员的品阶规定一些功臣们的排位可留在祠堂里，过了四代祭祀后就把排位埋在墓里。第三，墓祭。“国朝五礼仪”中记载到：在春节、寒食、端午、中秋、冬至等特定日期去宗庙和各种陵园进行墓祭活动。民间也根据这个规定在家里准备酒，水果和脯肉去祖宗坟墓祭祀。到至今也传承下来，是韩国祭祀活动中占比较大比例的，影响力比较深远的。

# 四、总结

朱子学传入之初被先进士大夫们接受，后来以此为指导理念建立了朝鲜王朝，之后被定为“国学”。从高丽末开始起重要作用的士大夫们成为朝鲜建国之初的主导力量，他们所研究的性理学替代佛教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理念。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而又特殊的关系，使得儒学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学问，而成为了指导阶层的统治理念、士人阶层的权斗工具。[[30]](#footnote-30)丽末鲜初朱子学被传入至最终确定为官学，经历了以下三部曲[[31]](#footnote-31)。首先，是被作为新的理论和学说而受到先进士大夫的关注并介绍到高丽；其次，被作为新的思想理论使用于排佛论的思想斗争中；最后，被革新人士所利用，逐渐确立为朝鲜王朝的指导理念，从此儒学获得了朝鲜官学的独尊地位。韩国的儒学思想是在本土形成的固有思想基础之上，吸收了中国的朱子学，并在适应本国国情的历史中形成的。上文主要从儒教建国的角度入手，依次研究丽末鲜初的政治体系、教育机制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特点，且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儒教对特定时期、特定王朝的更替和革新所起的指导性作用。但其思想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了那一段时期，而是对至今的韩国社会也起着深远的作用。韩国近代史上的朝鲜王朝是以儒家思想为建国和统治理念的“儒教国家”，其对现代韩国儒家文化的传承仍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参考文献

**现代研究论著：**

[1]【韩】闵兵夏. 高丽武臣政权研究[M].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90：36-43.

[2]【韩】李喜周. 韩国政治思想史[M].首尔：百山书堂，2005：168-171.

[3]【韩】金虎东. 高丽武臣政权时代文人知识阶级的现实对应[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108.

[4]【韩】闵炫丘. 高丽政治史论[M].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2006：152-174.

[5]【韩】沈安石. 高丽武人政权和地方社会[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40-55.

[6]【韩】韩忠熙. 朝鲜初期六曹和统治体系[M].大邱：启明大学出版部，1998:262-280.

[7]【瑞士】Martina Deuchler著. 韩国社会的儒教变化[M].李勋相译，大田：acanet，2003：42-50.

[8]【韩】张乙炳. 政治的交流论[M]. 首尔：名门堂出版社，1989：74.

[9]【韩】金云泰. 朝鲜王朝政治行政史[M]. 首尔：博英社，2001：208.

[10]【韩】李德日. 朝鲜王朝实录1（太祖-实现革命大业）[M].首尔：多山草堂，2018：34-37.

[11]【韩】韩英宇. 郑道传思想的研究（韩国文化研究丛书15）[M].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99：125-129.

[12]【韩】沈天植. 丽末鲜初性理学的传入与学脉[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4:602-620.

**期刊论文:**

[1]【韩】李宪昌. 朝鲜王朝的政治体系：绝对君主制[J].经济史学，2017（6）：215-272.

[2] 刘军. 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2）：92-96.

[3]【韩】李秀欢. 朝鲜初期学者们追求的儒教理想社会[J].退溪学与儒教文化，2015（4）：45-82.

[4]【韩】金云泰. 通过经国大典研究朝鲜王朝的政策决定过程[J].震檀学报，1979（1）：176-198.

[5]【韩】金敬容. 朝鲜中期科举制度的整顿过程及其教育意义[J].教育史学研究，2010（1）：1-27.

[6] 洪军. 丽末鲜初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J].史林，2015（6）：185-191.

[7]【韩】金敬容. 为了解朝鲜科举制度批判性地进行史料考察[J].教育史学研究，2001（11）：1-34.

[8]【韩】金陈旭.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人事政策研究[J].现代社会和行政，2005（1）：161-185.

[9]【韩】韩万峰. 科举制度考试周期的分析[J].谈论201，2006（4）：37-70.

[10]【韩】金道炫. 对科举制的批判性思考：以朝鲜时代的文科考试为中心[J].韩国行政史学制，2007（4）：1-35.

[11]【韩】张在天. 朝鲜时代成均馆儒生文化一考[J].韩国思想与文化，2001（4）：257-289.

[12] 邢丽菊. 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J].中国哲学史，2007（4）：90-101.

[13]【韩】尹珠熙. 高丽与朝鲜王朝的官僚管理制度：科举制度的再解释[J].韩国社会和行政研究，2000(2):139-163.

[14]【韩】李旭. 朝鲜时代儒教祭祀的扩散与牺牲的变容[J].宗教文化批评，2017(31)：47-90.

**学位论文：**

[1]【韩】金大宏. 经国大典的中央统治制度[D].首尔：首尔大学，2004-06.

[2]【韩】金宣民. 朝鲜初期宗亲政治排除的法制化[D]. 首尔：延世大学. 2017-04.

[3]【韩】姜恩敬. 朝鲜初期教育改革论和成均馆的役割[D].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校，2001-05.

[4]【韩】金仪宪, 朝鲜时代盲人教育的性格和类型[D].首尔：韩国师范大学，2017-02.

**论文集：**

[1]【韩】文惠静. 通过朝鲜王朝实录的大数据分析研究儒教政治[C].韩国信息协会论文集，2018(7)：253-261.

1. 【韩】闵兵夏. 高丽武臣政权研究[M]. 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90：36-43. [↑](#footnote-ref-1)
2. 【韩】李喜周. 韩国政治思想史[M]. 首尔：百山书堂，2005：168-171. [↑](#footnote-ref-2)
3. 【韩】金虎东. 高丽武臣政权时代文人知识阶级的现实对应[M]. 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108. [↑](#footnote-ref-3)
4. 【韩】闵炫丘. 高丽政治史论[M]. 首尔：高丽大学出版部，2006：152-174. [↑](#footnote-ref-4)
5. 【韩】沈安石. 高丽武人政权和地方社会[M].首尔：景仁文化社，2003：40-55. [↑](#footnote-ref-5)
6. 【韩】李宪昌. 朝鲜王朝的政治体系：绝对君主制[J].经济史学，2017（6）：215-272. [↑](#footnote-ref-6)
7. 【韩】金大宏. 经国大典的中央统治制度[D]. 首尔：首尔大学，2004-06. [↑](#footnote-ref-7)
8. 【韩】文惠静. 通过朝鲜王朝实录的大数据分析研究儒教政治[C].韩国信息协会论文集，2018(7)：253-261. [↑](#footnote-ref-8)
9. 刘军. 试论中国古代王朝宗室的构造特征[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2）：92-96. [↑](#footnote-ref-9)
10. 【韩】金宣民. 朝鲜初期宗亲政治排除的法制化[D]. 首尔：延世大学. 2017-04. [↑](#footnote-ref-10)
11. 【瑞士】Martina Deuchler著.韩国社会的儒教变化[M].李勋相译，大田：acanet，2003：42-50. [↑](#footnote-ref-11)
12. 【韩】张乙炳. 政治的交流论[M]. 首尔：名门堂出版社，1989：74. [↑](#footnote-ref-12)
13. 【韩】李秀欢. 朝鲜初期学者们追求的儒教理想社会[J].退溪学与儒教文化，2015（4）：45-82. [↑](#footnote-ref-13)
14. 【韩】金云泰. 通过经国大典研究朝鲜王朝的政策决定过程[J].震檀学报，1979（1）：176-198. [↑](#footnote-ref-14)
15. 【韩】金云泰. 朝鲜王朝政治行政史[M]. 首尔：博英社，2001：208. [↑](#footnote-ref-15)
16. 【韩】金敬容. 朝鲜中期科举制度的整顿过程及其教育意义[J].教育史学研究，2010（1）：1-27. [↑](#footnote-ref-16)
17. 【韩】李德日. 朝鲜王朝实录1（太祖-实现革命大业）[M].首尔：多山草堂，2018：34-37. [↑](#footnote-ref-17)
18. 【韩】韩英宇. 郑道传思想的研究（韩国文化研究丛书15）[M].首尔：首尔大学出版部，1999：125-129. [↑](#footnote-ref-18)
19. 【韩】沈天植. 丽末鲜初性理学的传入与学脉[M].首尔:京仁文化社,2004:602-620. [↑](#footnote-ref-19)
20. 《世宗实录·地理志》是端宗登基第二年（1454年）颁布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中的一部分，记载在148卷到155卷的全国范围内比较完善的地理志。 [↑](#footnote-ref-20)
21. 【韩】金敬容. 为了解朝鲜科举制度批判性地进行史料考察[J].教育史学研究，2001（11）：1-34. [↑](#footnote-ref-21)
22. 【韩】金陈旭. 朝鲜王朝科举制度人事政策研究[J].现代社会和行政，2005（1）：161-185. [↑](#footnote-ref-22)
23. 【韩】韩万峰. 科举制度考试周期的分析[J].谈论201，2006（4）：37-70. [↑](#footnote-ref-23)
24. 【韩】张在天. 朝鲜时代成均馆儒生文化一考[J].韩国思想与文化，2001（4）：257-289. [↑](#footnote-ref-24)
25. 【韩】姜恩敬. 朝鲜初期教育改革论和成均馆的役割[D].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校，2001-05. [↑](#footnote-ref-25)
26. 【韩】金道炫. 对科举制的批判性思考：以朝鲜时代的文科考试为中心[J].韩国行政史学制，2007（4）：1-35. [↑](#footnote-ref-26)
27. 【韩】尹珠熙. 高丽与朝鲜王朝的官僚管理制度：科举制度的再解释[J].韩国社会和行政研究，2000(2):139-163. [↑](#footnote-ref-27)
28. 【韩】金仪宪, 朝鲜时代盲人教育的性格和类型[D].首尔：韩国师范大学，2017-02. [↑](#footnote-ref-28)
29. 【韩】李旭. 朝鲜时代儒教祭祀的扩散与牺牲的变容[J].宗教文化批评，2017(31)：47-90. [↑](#footnote-ref-29)
30. 邢丽菊. 试论韩国儒学的特性[J].中国哲学史，2007（4）：90-101. [↑](#footnote-ref-30)
31. 洪军. 丽末鲜初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J].史林，2015（6）：185-191. [↑](#footnote-ref-31)